

人格完善与传统宗教精神审视

——“法轮功”现象之后的理性反思

詹石窗

本文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人格完善与传统宗教精神的关系问题,指出人格完善的反面就是人格灾难。“法轮功”歪理邪说在生命伦理上的危害乃在于造成了人格灾难,这种人格灾难在理论上就是背弃人文精神。作者通过传统人文精神发展历程的回顾,指出了法轮功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辨了邪教与合法宗教的界限,从人类生存哲学的范围阐述了传统宗教文化体系在人格完善教育中所具有的某些合理因素。

作者詹石窗,1954年生,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变化日新月异。面对逐步加速的生活节奏和社会转型,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悲观厌世。于是,在“末世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法轮功”的炮制者以其戕害人性的手法导演了一场邪教乱象闹剧。经过一个阶段的揭批工作,人们终于看清其真实面目。然而,就学术角度而言,法轮功现象的原因,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大家知道,“法轮功”炮制者是以其神秘功法诱骗人,同时又歪曲地利用了某些传统宗教观念、术语来装璜门面。就人文教育的立场来看,“法轮功”歪理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它对人格完善的冲击,其次是混淆了合法宗教与歪理邪教的界限,从而造成了文化生态的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就人格教育及其与传统宗教精神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一、人格完善与人格灾难

从表面看来,“法轮功”似乎是一种技术性操作,但若深入一层考察其观念形态,那就会发现,其中还涉及做人问题。就更广阔的范围说,这涉及人在广袤宇宙中“安身立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轮功”炮制者所宣扬的一套“大法”的直接后果概括起来就是造成了一场人格灾难。

什么是“人格”?就语义学而言,它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指人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性资格。这个层面表现为物质属性与法律属性的统一。第二,是指作为人应有的品德、

尊严、体面等。这个层面主要表现为伦理道德属性。第三,是指人的气质、性格、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与第一、第二两个层面相比,第三层面的意义侧重于人自身的个性存在与发展。关于人格的三层语义,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应用;但它们彼此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

从历史观点看,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个人身心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人格会发生质量变化。某种能力的提高或者降低、道德境界的升华或者下降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标志着人格存在的“量”的变迁;当这种变迁在总体上达到一定的“度”即引起人格存在“质”的变迁,或者向劣质态变迁,或者向优质态变迁。

当然,人格也有相对稳定性。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人格内涵的品德是受社会政治伦理制约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伦理观念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它必然对人格的品德等内涵产生规范作用;另一方面,人的气质、性格与先天生理因素也有关系,这种先天因素也对人格的相对稳定起支撑作用。不过,从人格存在的总体格局来看,“变”与“不变”乃处于既矛盾又整合过程中。

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安身立命需求呼吁“理想人格”。从一般的意义说,理想人格应当具有高尚道德精神、健全体魄和掌握社会服务完善技能的典型人物品格。理想人格虽然不是一般人都能够达到的,但它却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示范指导意义。因此,千百年来,各个学派向来都注重理想人格的研究与宣传。理想人格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靠社会的教育和个人的修养。这两者的结合,从良性方向发展,就造成人格完善;反之,则造成人格灾难。

纵观人类历史可知,每一社会文化形态都是以前一社会文化形态的合理内容为基础的,同时又因本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而确立,人格文化形态也是如此。因此,人格完善的文化意义应当是包含了传统的优秀内核,并且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要求。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学术界逐步形成了人格完善的理论,这就是在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生观,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爱国爱民、奉献社会、热爱劳动、勇于创新、勤奋学习等良好道德情操,顺应规律地增进身心健康。从教育学的观点看,这种人格完善也就是促成德、智、体、美的全面良性发展。在这种人格完善理论指导下,我国培养了千千万万的优秀人才,从而为社会各行各业的进步与发展积蓄了力量。

然而,社会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运动发展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人格完善教育常常受到干扰。十年文革动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都是对人格完善教育的冲击。“极左”和“自由化”思潮汹涌时期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人格完善。一方面是“个人崇拜”和“绝对自由”的狂热鼓吹,另一方面是人的尊严的被剥夺,所造成的人格灾难后遗症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压抑之后暴发了新的病灶。近年来“**法轮功**”歪理邪说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后遗症的延续,造成了新的人格灾难。这种灾难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在心理上激发了信奉者的奴役性格偏差。“**法轮功**”炮制者把自己抬高成新“教主”,运用种种手段、抓住各个场合、以种种方式张扬个人崇拜和抛弃政府,在“世界末日”的叫嚣声中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这种宣传引导实际上是要信奉者对这位炮制歪理邪说的新“教主”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对炼功者来说,接受这种观念的直接灾难就是不

知不觉地造就受奴役的性格偏差。二是在生理上造成自我的内在攻击偏差。“法轮功”炮制者把个人凌驾于众人之上和宇宙之上，膨胀个人的主观意志，企图诱导信奉者修炼所谓“法轮大法”，这种不能排除杂念私心的虚妄追求必然使内在阴阳气血失调。因为企图心过重不仅违反了传统的养生精神，而且背离了个性修养的刚柔相济原则，结果是使妄念化成幻觉，又把幻觉当作真实。这种“以幻为实”的思维偏差最容易导致走火入魔，形成自我邪念对自我体魄的杀伤，难怪许多人迷信这种歪理邪说之后就剖腹或者跳楼自杀，其教训十分惨痛。三是在伦理上造成虚妄偏差。尽管“法轮功”炮制者在“理论”上煞有介事地声称以“真、善、忍”为德行，但在实际上却又鼓动其信奉者聚众闹事，这本身就违背了他所规定的“忍”的教条，而所谓“真”就是要人们相信他那一套充塞神秘说教的假货，所谓“善”就是要修炼者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法身”的奴役。按照他这种“德行”教条来行事，必然造成观念与践履的矛盾对抗，而这反过来又戕害了修炼者自我的身心。可见，他的“德行”教条实际上是“以假为真”、“以恶为善”。四是在功理上造成狂热偏差。法轮功炮制者自称“功力”超过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千百倍，也远远在道家开山祖老子和儒家先师孔子之上，这完全是狂人的口吻。以他这种狂人为“楷模”而修炼，就是提倡狂人的复制。难怪许多人听信他的狂言而付诸操作就发狂。这正是人格灾难的证明。

二、人格灾难与人文精神的呼唤

面对“法轮功”炮制者所造成的人格灾难，人们正在进行思考和探究。关于这场人格灾难发生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如迷信温床的存在、国际“末世情绪”的流行、小生产者意识的影响等等。这些当然都可以看作是法轮功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是，如果从内在因素方面进一步加以探讨，就会发现还有重要的方面应该予以考虑。

“法轮功”现象既然造成了人格灾难，我们也就应该从人格教育方面考察事件发生的根源。人格的承担主体当然是“人”，而人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他不仅有自然属性，而且有社会属性。人既生存在自然环境中，也生存在社会环境中。人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二重性生存中，一方面要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也改造环境，从而创造文化和发展文化。所谓“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凡是打上人类观念烙印的客观存在都是文化。换一句话说，文化乃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生存环境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文化的重要构成是科学技术，而其内核则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要完善人格，就必须进行文化教育，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武装人的头脑。科学与人文，这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两大杠杆，人类不能没有科学，也不能没有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格是积淀着科学与人文两方面内涵的。所以，“人格高低”应当是以文化的含摄质量为考核标准的。因此，人格的完善不仅需要科学精神的不断滋补，而且需要人文精神的绵延养育。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科学技术教育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概念呢？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中的“科学”仅仅当成自然科学。实际上，这还应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一个文明社会如果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为了人才培养而进行的人格教育同样不能

忽略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精神”的陶冶。

什么是“人文”呢?从传统上说,它既指礼教文化,又指人事。在更多场合,“人文”是就前一种意义讲的。因此,人文精神主要是从礼教文化引发出来的。最早言及人文的是《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刚美与柔美交相错杂,这是天的文彩;文章灿明止于礼义,这是人类的文彩。观察天的文彩,可以知晓四季转变的规律;观察人类的文彩,可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由此可知,古典“人文”意义是与“天文”对举而言的。古代所谓“天”往往代表了宇宙自然;所以,对天文的观察实际孕育了后来的自然科学;而对人文的观察实际上就是对人际社会的调查研究,这可以看作是人文科学的发源。古人所谓“观乎人文”不仅是与“观乎天文”密切相关的,而且蕴含着一种社会规范的精神。

在学术界,人们一般把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当作“人文精神”昌盛的历史标志。他指出:“发生于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代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及其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Buddha)的时代……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①雅斯贝尔斯通过历史的考察之后认识到这一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在各处都开始意识到作为整体的存在,意识到他自身和他的限度”。在这个时代中,开始了建立“理性与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反神话斗争”,道德的义愤“同虚妄的诸神作战”^②。按照雅斯贝尔斯的看法,所谓“轴心时代”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种理性生存精神。它意味着“人”的自我觉醒和一定程度的“自律”。雅斯贝尔斯是一个“中国通”,他的论述是从中国的例证开始的,接着讲到了印度和希腊。检索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们的确是可以感受到“轴心时代”那种理性生存精神的呼唤。思想家们以其社会责任感审视人类自身的生存原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从宏观角度思考“人”与宇宙万物的关联,不仅确立了物质性的“道”的本体核心意义,而且肯定了“人”作为“域中”即宇宙中“四大”(道、天、地、人)之一的地位,提出了“知常”、“修身”、“自胜”的一系列命题,阐述自我人格修养的基本方法,申明了道家学派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立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奠定了传统人本主义的根基,从现实角度来考虑人对“无限性”与“永恒感”的安顿,提倡人文生活的“道德自觉”和“仁者爱人”、“止乎礼义”的群体生活社会责任感,并把这种精神贯注于人格完善的修持践履过程中,以“内圣外王”的“圣功”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儒道两家所发明的传统“生存原则”凝聚着人格完善法门的“自律”理念,闪烁着古老人文精神的辉光。

由道家与儒家所阐扬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

①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页。

②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1页。

发展之所以比西方更具有理性特征,实有赖于儒道两家所倡导的生存人文精神,它对于抑制邪教具有独到作用。因为邪教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和谐次序的反动,而人文精神则着眼于人类的整体生存次序及其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关系。人文精神高扬之际,社会就有序地运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获得了推动,邪恶的神秘骗术也就收敛,群体生活中的人格完善就有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法轮功”歪理邪教如沉渣泛起,在中国大地上孽生流衍了相当一段时间,它对人性的践踏所造成的人格扭曲实在需要我们对多年来人文教育的方式作一番深刻反省。

三、人文精神及合法宗教与邪教之分野

从许多报刊杂志所披露出来的事实可知“法轮功”炮制者自欺欺人的一大特点是窃取传统宗教中的某些观念和语汇并进行阉割歪曲,瞒天过海,诱骗众人。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手法非常恶劣,不仅把水搅浑了,而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把“法轮大法”这种邪教与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传统宗教严格区分,那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我国民政部与公安部在发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非法组织的《通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提高认识,看清危害,把握政策,维护稳定》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特别指出,要“把正常的宗教信仰、合法的宗教活动与‘法轮功’组织的活动区别开来。”^①社论不仅科学地把握了政策界限,而且包含着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这就是合法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所谓“邪教”就是邪恶之教。在语义学上,“邪”是与“正”相对而言的。邪就是“不正”。《尚书·大禹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传统中医学把四时不正之气,能伤人致病的风寒暑湿称之为“邪”,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另外,“邪”还有特殊意义,这就是指妖异怪诞之事。如《南史·袁湛传》附袁君正传称:“性不信巫邪。”佛教称“妄见”为“邪魔外道”,通指各色鬼怪。

邪教古已有之。“淫祀”就是属于邪教的一种。《礼记·曲礼下》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汉书·郊祀志上》称,正教“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可见,早在封建社会中,淫祀一类邪教已遭到官方的禁止。不仅如此,一般民间宗教也反对淫祀之类邪教。如汉代的道教对于曹操在济南任相时毁坏淫祀祭坛的行动即大加赞扬。邪教之所以在古代就受到禁止,是因为它逆反社会,惑乱人心。但由于种种原因,邪教一有时机总要“登台表演”。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地衍生出许多新的邪教。如日本的奥姆帝国教(奥姆真理教)、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希腊的黑魔教、瑞士的太阳圣殿会都属于这种类型。20世纪出现的邪

^① 按,该社论载于7月23日《人民日报》。

教,其主要特点是对现实的叛逆性,提倡超常的神秘体验,压抑人性,宣扬“末世论”,具有明显的教主崇拜倾向和商品化倾向,以伪科学形式兜售迷信货色。在文化思想上,邪教的特征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和对抗。“法轮大法”也基本具备了这些特征。

从外在形式看,合法宗教与邪教都是有神论,但其内涵却有很大的差别。什么是宗教?近代以来,中外学者提出了种种关于宗教的界说或者宗教属性的描述。英国《牛津字典》把宗教界定为“人类对一种看不见的超人间力量的承认,这种力量控制着人类命运,人类对它服从,敬畏与崇拜。”德国《柏特尔斯梅小百科全书》说:“宗教是大量历史现象的一种象征标志,这是以人们对超宇宙神祇的体验所作出的特定行为规范方式作为这种象征标志的基础。”恩格斯对宗教也有一个表述:“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由此可见,宗教的认识也是建立在人类生活基础之上的。尽管它具有“幻想”的特征,但若进行人类学的还原,则可以发现其体系之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包容以其象征标志将社会生存规范的诸多意蕴演示出来。在这一点上,正统宗教与邪教的反人文特性是根本对立的。

正如世界上大部分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度一样,中国宗教的形态也经历了原始宗教向古典宗教转换的过程。按照汉朝人许慎《说文解字》的义读,“宗”本来是表示对祖庙的尊敬,而“教”是表示“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文、孝。”从这种语义解释可知,自从原始宗教向古典宗教过渡之后,祖先崇拜成为宗教形态的主体,这种宗教形态以“孝道”为文化核心,而“孝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基础^②。先秦儒道两家都对孝道的人文意义相当关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虽然以“道”为宇宙本体,但并不反对上古宗教中“孝”的精神。在道家学派看来,只有超越了“仁义”的阈限才能恢复孝道的淳朴本质,修持孝道是一种归根还原的功夫。与道家相比,儒家对孝道更加提倡,出于和谐社会秩序的考虑,儒家通过历史的追索和“神道设教”的宗教祭祀礼仪以建构颇富人文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在儒家看来,孝道不仅是立身之本、齐家之宝,而且是治国之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中心。在孝的理念引导下进行祭祖追远的礼仪活动可以安顿生命主体的永恒感和族群绪绪的绵延不绝。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家实已具备了宗教的基本功能。由于儒家祭祖溯源的理论性格始终贯彻着人文精神,力图通过礼乐教化以培养良心,有人干脆把儒家称作“人文教”或者“良心教”。这虽然还没有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同,但至少反映了儒家的部分宗教属性。因此,历史上将儒家直称之为儒教^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汉以来,经过儒道两家的发扬,中国逐步完善了以“孝道”为根本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与学说,并且深深地影响于东汉所形成的“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卷第666—667页。

② 从《尚书》等古文献的记载可知,中国在尧舜时期已有以孝化民的教育举动和诸多孝行的传说。

③ 关于宗教的范围界定,以往由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所以许多学者往往看不到中国本土宗教的特点。现在,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国情和历史之传统对宗教加以重新的考察。

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它以先秦道家文化为母体,同时吸取了儒家、神仙家等文化内容。出于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宗旨,道教中人既要探究养生的法门,也要规范行动道德,因此也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著名道教研究专家卿希泰教授说过:“道教的人生哲学和伦理学合二为一。”这的确是精辟的见解。从体系上进行整体把握,我们可以说,道教乃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大载体。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及其行动规范通过符号法式得到了特殊的演示。在道教中,神仙乃凝聚着美善精神,是人格完善的理想典型^①;仪式是传统礼俗的沿袭与变迁,是弃恶向善的象征表达;戒律针对人性过分的欲望,力图使信奉者遵循社会规范和教门秩序,而养生法门则把形体的修养与内在的人格完善精神升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切都表现了道教的人文精神。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一些有影响的境外宗教也先后流布来中国本土。其中,最重要的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正如中国固有宗教一样,这三大宗教也有自己的伦理观念。其内容主要涉及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结。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与其它宗教一样,在伦理道德上不可避免要维护“神”在信仰中的地位,但归根结底,其伦理信条则应该从人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根源。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些宗教中,其伦理道德规范最终都落实到人的生活中。如基督教《摩西十诫》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财物”为信条。伊斯兰教《古兰经》规定信仰者不仅要孝敬父母、尊重亲友和邻居,而且应乐于施舍、救助孤贫等。佛教的五诫以及诸多劝善的言论都体现了人本性的伦理特征。这些宗教在各自的领域中都对人格完善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这些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从而使人文精神得到了弘扬。当然,从总体上看,宗教与唯物论是相对立的,其功能作用也具有二重性,但在各自体系中含摄了人文精神却是客观事实。假如我们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人文精神进行理性的考察,应该可以发现一些对于人格完善教育有所裨益的内容。

(责任编辑 王子华)

① 在道教中,有所谓“忠孝神仙”之说。净明忠孝道即以“忠孝”为修持的境界和门径,具有突出的伦理色彩。被该道派所尊奉的神仙人物许逊、吴孟都是奉行“孝道”的典型。